

《千顷堂书目》“传录体”考论

刘 净 净

关于古代目录的提要体例,王重民先生曾明确指出,我国古代提要目录有叙录体、传录体和辑录体三种类型。“刘向校书的叙录能够全面的评价一书的内容(包括著者事迹),是我国编写提要、解题的正宗”。“王俭《七志》对撰人‘每立一传’以代替提要,僧佑的《出三藏记集》述列传以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”^①。不过,目录学史上,关于传录体的界定还是有着一定的分歧,即被著录之书作者的简要传略,还是被著录之书的简要注释。叙录体和传录体的最大区别应在“传”字,如果将“传”字释为注释解说而非传略,传录体与叙录体几乎可成为同一种体裁,失去其自身之特征。故不少学者认为南朝《七志》开传录体之先河,“不述作者之意,但于书名之下,每立一传”^②。笔者亦认为此说更为合理。

传录体,以人为主,论书先记人,由叙述作者生平获得对书的认识。通常认为传录体始于南朝《七志》,魏晋南北朝之后几难见到,《千顷堂书目》亦被列于传录体之外。然而,考查《千顷堂书目》小注内容,很少谈及书之本身,大量的书名下附有作者小传。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评价《千顷堂书目》:“书目卷数之外,更注撰人略历,较其他各志,特为详明。”^③其每书下著录作者姓名、卷数等内容,多数条目下作小字记注。小注内容论及作者字号里籍、科名官爵、生平经历,偶述成书年代、内容要旨等,其中记述内容最多的是作者里籍字号,多数作者小传中均有涉及。且著录作者小传之小注,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均有。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来考查《千顷堂书目》的体例问题。

确定一部书目之体例,书目内容自是考查的重要方面,著录内容的特点和数量亦是主要判断点。就著录内容而言,《千顷堂书目》不重书之内容、学之渊

①王重民:《中国目录学史论丛》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80页。

②《隋书·经籍志》卷一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4页。

③姚名达:《中国目录学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81页。

源,而重立传,注重对作者的介绍;有时在书名、卷数之外,只注作者小传,只字不提书之内容。书名卷数之外的小注内容虽然有繁有简,但无论繁简大都以作者小传为主。繁者,几十到数百字不等,如开篇易类即有“鲍洵《大易钩元》三卷,字仲孚,嘉兴人,领元乡荐,明初以明经老儒召为文华殿大学士,固辞归。恂受易于吴草庐”^①;简者,寥寥两三字,但也要标注作者籍贯或字号,如:“戴埴《鼠璞》一卷,桃源人”^②;“张九韶《理学类编》八卷,字九韶”^③。再者,《千顷堂书目》作者小传并非集部或其他某一部类所特有,而是经史子集四部均有大量作者小传。比如:经部就有“周聪《周易讲义》二十四卷,字敬之,江西乐平人,嘉靖中贡士,英山教谕”^④,介绍了周聪的字号、籍贯和官职;史部“杨寅冬《历代史汇》二百四十卷,泰兴人,杨寅秋弟,有孝行称”^⑤,不但介绍了杨寅冬是泰兴人,是杨寅秋的弟弟,还指出了其孝行之品性;子部“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五十一卷,又续稿□卷,字仁宝,杭州人,性孝,两刲股愈母疾,内行尤至”^⑥,不但指出郎瑛孝行之品行,更是举其“两刲股愈母疾”之例;集部“胡俨《颐庵集》三十卷,字若思,南昌人,洪武末会试乙未科,授华亭教谕,永乐初擢翰林检讨,同解缙等直内阁,寻迁国子监祭酒,洪熙元年加太子宾客,致仕”^⑦,详细介绍了胡俨的历任官职。四部当中以集部小传著录详备,数量巨大,最为丰富。

就著录数量而言,整部《千顷堂书目》共著录:经部十二类,收书共 2400 余部;史部十八类,收书 5060 余部;子部十三类,收书 2980 余部;集部八类,收书 7370 余部。“计明代著作一万五千四百余部,宋、辽、金、元著作二千四百余部,共一万七千八百余部”^⑧。其小注内容,著有作者小传者占其大部。据笔者统计,书名卷数之外,只述作者小传者,达 8240 多条,约占整部书目半数以上;只录书名或卷数,无任何其他内容者 6820 多条,两者合计占全部书目之大部。其余两类:既有作者小传又有其他内容者,合计仅约 2000 余条。相较只述作者小传者,足足差了 6000 余条。无论是著录数量,还是所占比例,作者小传均可谓《千顷堂书目》小注内容的主体。

从《千顷堂书目》后续的增补来看,最早杭世骏增补 293 条;后卢文弨又补入 363 条,但均已不传;今存吴騫校本又补入 239 条,且广集朱彝尊、杭世骏、卢文弨等学者的增补考订。以瞿凤起、潘景郑整理本为底本进行整理统计,其中“卢补”“吴补”“别本有注文”者,共计 500 多条,即增补 500 多条。其

①黄虞稷撰,瞿凤起、潘景郑整理:《千顷堂书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 年,第 1 页。

②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 329 页。

③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 297 页。

④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 6 页。

⑤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 117 页。

⑥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 339 页。

⑦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 487 页。

⑧来新夏:《清代目录提要》,齐鲁书社,1997 年,第 29 页。

中,全部增补内容均包含作者小传,且大量内容是仅增补作者小传而无其他内容。由此可见,几位考订学者都非常注重《千顷堂书目》的作者小传,认为此乃其重要特色。如此多的增补只注作者小传,实则已将其视为传录体以做考订增补。换言之,亦仅有此类考订增补,方能确保与原书体例之相得益彰。

二

黄虞稷在《千顷堂书目》中远绍王俭《七志》而采用传录体来著录增补书目,与明代书目的著录风格及《千顷堂书目》的编纂体例有着直接的关系。《千顷堂书目》摒弃纪藏书之盛的传统做法,开创纪明一代著作之目录,兼附四代,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。然而这一重大举措,也使得整部书目的编纂剥离了此前历朝历代之著作,只留明代著作。从时间上做断代处理,相应地历史脉络、学术承递源流无形中被弱化,作者更多关注明代之状况,于明代学术之繁盛、明代之人物、明代之著作更为体恤关照。诚然,如若想做部类或书目解题,亦可于部类之前做学术之解题;但作者意非如此,而是寄意于“知人论世”角度论及作者,不求书目源流考辨。这与明代以来的学术风气有着一定的关系。明代目录学家整体不重书目及学术流变之解题,一部《百川书志》外,再无提要目录。黄虞稷自不免受此影响。

此外,明代著述宏富,黄虞稷以绵薄之力,纪明代之著作,非自家藏书,实非易事。如若再细考每书每人之历史脉络、授受源流,几难达到。作者又力求将《千顷堂书目》编纂为知见性目录,不限于自家藏书。大量书目只得由别家书目或其他渠道了解,并未亲见其书,自是无法为其做解题。如此,作者自是不便把重心置于学术之穷源至委、辨章考镜上;相较而言,重于立传,则相对为宜,既无学术考校之难,又合纪明代之意,更好地反映明代之状况。

基于以上两点,黄虞稷亦可采用只做书名卷数更为简单之著录,但黄虞稷在是否著录作者小传两相取舍之间,选择著录大量作者小传,其根本原因,则是受我国“知人论世”遗风的影响。自孟子提出此主张以来,很快便延伸到了文学批评、人物品评、升官进爵等社会的诸多方面,成为影响士人升迁的重要因素,亦是仕子们信奉之教条,“知人论世”更成为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之传统。黄虞稷自是深受其影响,加之作者小传资料又便于获取,故在其《千顷堂书目》中,采用书名卷数下加注小字,记述作者生平传记之法,力求让读者知其人读其书。世隔数朝数代之后,延用王俭《七志》所创之传录体例,再次将其应用于综合性目录之中。

三

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和品评之风的盛行,是传录体目录得以勃兴的沃土,那明代社会同样具备这样的条件。明代的门阀制度也较为严格,品评之风兴盛,突出的表现就是登科录和地方志很受重视,较为盛行。明代的

登科录极为兴盛,已完全融进了明代的政治活动、民间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之中,成为明代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而地方志,虽形成完备于魏晋南北朝时期,宋代又有重要发展,但都不及明代发达。明代社会,地方志得以大力发展,达到鼎盛,就连皇帝都参与修志,如明成祖朱棣曾两次钦定并颁布纂修志书的凡例,钦定方志篇目为二十一类。据不完全统计,明代志书多达一千余种。此种风气在《千顷堂书目》的“传录”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,即重出身重籍贯,甚至于不排除有些小传辑录于当时的登科录或地方志。如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一著录叶良佩《周易义丛》,小注记著者“字敬之,天台人,嘉靖时”^①,该书卷六著录叶良佩《太平县志》,小注曰“嘉靖庚子修。邑人”^②。黄虞稷极有可能就是根据《太平县志》中有关叶良佩的记载提炼了小传资料。故登科录、地方志中的人物史料,应是黄虞稷撰写作者小传的重要资粮。

这也正是《千顷堂书目》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目传录内容的最大区别,虽然都是对作者的介绍,但侧重点却不尽相同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录体目录,受当时谱系之学大兴的影响,传录的内容重于追叙先世显位,详述其仕履官阶,旁及其子孙后代等方面,带有浓厚的家谱、家传色彩^③。例如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注引挚虞《文章志》曰:“(崔)烈字威考,高阳安平人,弼之孙,瑗之兄子也。灵帝时官至司徒、太尉,封阳平亭侯。”^④又如王俭《七志》中的传录,蜀才是王弼后人^⑤。《千顷堂书目》的传录内容,则与当时登科录、地方志盛行有着一定的关联,即登科录或地方志之列传,为黄虞稷采用传录体编纂《千顷堂书目》提供了便捷的传记资料。登科录关于某人之列传,多述其科名官爵;地方志则多述其字号里籍。这与《千顷堂书目》中作者小传的记述是十分吻合的,即注重作者字号里籍、科名官爵,即使最简单的著录,也要著录作者的籍贯或者字号。比如“李如玉《周礼会注》十五卷,如玉,同安县儒士,嘉靖十八年令其子诣阙奏进,帝嘉其究心礼书,令给冠带荣身”^⑥;“顾谅《仪礼注》,字季友,吴江人,王行为作传”^⑦;“吴昂《周礼音释》,号南溪,海监人,进士,官福建布政使”^⑧;“王磐王西楼《野菜谱》一卷,高邮州人”^⑨;“史弼《省己录》一卷,字君佐”^⑩。最简单的两三字小注,也会注上“××人”、“字××”等内容。这一方面说明《千顷堂书目》中的作者小传当大量参照了当时盛行的登科录和地方志;另

①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5页。

②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184页。

③李国新:《品评人物之风大盛与传录体目录的勃兴: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》,《山东图书馆季刊》1990年第4期,第13页。

④《世说新语笺疏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229页。

⑤陆德明:《经典释文》卷一注引,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,上海商务印书馆,1919年,第6页。

⑥⑦⑧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36页。

⑨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331页。

⑩《千顷堂书目》,第330页。

一方面,也是明代的学术和文化在传录体目录中的反应,可谓是传录体目录延续到明代的特色和演变。

四

与此前采用传录体的专科学目相比,黄虞稷的《千顷堂书目》,无论是作者小传的著录方式还是著录数量方面,都更加完整、详实,可谓继王俭《七志》之后又一部综合性传录体书目。其所著录作者小传于考证明代人物传记资料有重要学术价值,可谓“列传”之功用。《千顷堂书目》力求记述明一代之著作,著录的书籍也并不限于自家所藏,范围广泛,采摭繁富,它收录了上至明代十六朝帝王将相的著作,下至文人平民的野史杂记。如南京官制职掌、名胜古迹、乡贤传记以及诗文集等,无所不录。相应地作者小传自然也博采广罗,较为丰富,且可信性较强,史料价值极高。

于今之学者而言,《千顷堂书目》是研究明史的一把钥匙,其所著录作者小传亦是研究明代人物传记之资粮,其中“集部”小传弥足珍贵,因为大量文人于正史中无传。古代的文学,大量的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,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。许多文集都流传于民间,官修书目、史志书目中往往缺漏很多,而集子的作者更是无从入之正史,对于他们的情况,正史中自无从查考。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的作者小传,可谓极佳之补充。比如,宋元以来词曲兴盛,黄虞稷增设的词类,所附作者小传则收录了大量词作者的小传资料。整部《千顷堂书目》集部图书最多,约占总卷数一半,著录作者小传也力求完备。

综观整部《千顷堂书目》之著录情况,无论是著录数量,还是著录内容,以及其“列传”之功用,该书都应被划为传录体之列。

作者单位: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、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